

刘道义

英语教育
自选集

刘道义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刘道义英语教育自选集

Liu Daoyi'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刘道义

英语教育
自选集

刘道义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刘道义英语教育自选集

Liu Daoyi'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道义英语教育自选集 = Liu Daoyi'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 刘道义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12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ISBN 978-7-5600-7149-7

I. 刘… II. 刘… III. 英语—语言教学—文集 IV. H3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274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选题策划: 刘相东

责任编辑: 刘相东

执行编辑: 张 蘅

封面设计: 袁 璐

封面题字: 赵发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8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7149-7

定 价: 45.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出版前言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第一批共推出 10 集，入选作者有王宗炎、桂诗春、胡壮麟、胡文仲、戴炜栋、秦秀白、刘润清、张正东、文秋芳、刘道义等英语教育名家。

本丛书专收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白：1. 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的自选集；2. 以英语教育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本丛书同时入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题项目”。本丛书的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师范院校英语本科生等，可作为他们从事科研、撰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入选的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觅得。自选集展示了诸位名家在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将成为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史料。

本丛书将在推出第一批后，陆续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外研社还将推出《国际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敬请读者关注。

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如下：

一、只收发表于刊物或论文集集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演讲稿，字数没有限制。专著中的章节一般情况下不收录。

二、所收论文的语言仅限汉语和英语。

三、所收论文的内容必须与英语教育有关，如语言政策、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法、词典与英语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特殊用途英语、计算机辅助教学、文学文化与英语教学、语料库与英语教学、教师培训与发展、评估与测试、课程设计与材料评估、英语专业各门课程的教学、大学英语教学、中小

学英语教学、儿童英语教学、双语教育、在线英语教育、远程英语教学，以及其他与英语教育有关的论文。

四、所收论文大多为原已发表过的文章，基本保持原貌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文章一般注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发表刊物的名称（或论文集名称）和期号（或出版社名称）。文章格式也基本保持发表时的原貌。未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演讲稿等，则注明对外发布（成稿）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五、作者可将新的观点以尾注的方式放在当篇论文的后面，表明作者目前的观点与当时有所不同。

六、书前有作者撰写的《我与中国英语教育》为自序。书后附有作者著述目录。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2006年9月9日于北京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主 任 胡文仲 李朋义

委 员 胡壮麟 王守仁 石坚 秦秀白 杜瑞清

策 划 刘相东

序

在《琼林撷萃》一书的编写说明中，我曾例举 50 年中师友对我影响很大的事迹，其中之一是“刘道义编审的敬业忘我”。因为道义编审在大、中、小学执教 17 年后从事基础教育英语教材的编写，已参编、主编了九部教材；秉持洋为中用的理念，把国外新兴理论引入中国英语教学实践，并积累了中外合编英语教材的经验。她还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达 8 年之久，推动了全国英语教师教育和教学科研，并提出过不少改革建议。现在她年近古稀，仍承担了新课标实验用的初、高中英语。她在工作和研究中不舍昼夜，并奔走于全国。尤其可贵的是，她在与时俱进之中，做到了继往开来。

我认识道义编审是 1981 年仲秋，在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外语教学大纲和教材审稿会》英语组会议之时。那时她刚从英国专门考察教育图书出版业务 7 个月后回国，当然了解西欧刚刚兴起之语言教学功能法的情况，而我们还在从影印本杂志中了解国外 1980 年的信息，可她在会上只专注地听而不发言。从我后来了解的事实来看，她是在琢磨国外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反映她治学的严谨态度和以中国学生为本的理念。

自那以后，由于当时人教社承担着编制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的任务，我不时应邀前去参会，与她成了“道义”之交。1986 年起她投入了为编写中英方合编初、高中英语教材^①的准备工作。1988 年她接替张志公先生担任分管外语的副总编；从此一日三班，全身心地投入这部教材的编写、使用及修

① 指我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英国朗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合编的初中英语教科书 (*Junior English for China*) 和高中英语教科书 (*Senior English for China*)。

改，每年只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后，初中和高中英语教学大纲先后作了修改，以后颁布了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两个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道义编审又根据新课标的理念，将中英合编的初、高中英语教材进行大修改，以满足新课标实施前过渡时期的需要。这项工作直到2005年才全部完成。而这时的她已从我最初见到的那个兼具江南才女和北国侠女之气质的青中年，变成了一个老年学者。所以中英合编的初、高中英语教材是道义编审用自己生命之浆浇灌出来的花朵。我这篇序也就谈一谈个人对这部教材的一些看法，希望有助于通过刘老师的自选集把中国人为中国学生编写英语教材所创造的经验保存下来，供当前和今后编写多种英语教材参考，也为研究我国外语教育史留下一些史料。

我想简要地谈三点：教材的价值，编写中克服的困难，成功编写的条件。

1、教材的价值

（1）学术价值

一部教材的灵魂是它所秉持的教学观点。教学观点既得有理论根据，又得切合使用者的实际。我国教材编写观点一直引自西方。建国前的优秀英语教材首推林语堂的开明英语和开明语法，以及张士一的直接法英语。前者主要引用叶斯柏森的观点，后者主要引用帕默的观点。中英合编英语却把交际教学思想本土化，构建了华式结构功能法。这个观点适应了中国学生学英语之时思维发展水平远远超过目的语语言水平的特点，继承了我国运用语法翻译法和听说法的经验，结构与功能互涵，并把功能范畴通俗化，且采用五步教学模式予以实施。这在当时独树一帜，昭示了中国特色，为中国英语教材编写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承前启后的基础。

（2）实践价值

我国自1862年开始以英语为主的近代学校型外语教学以来，百余年中所用教材唯有道义编审主编的中英合编教材在观

点、途径、内容诸方面初、高中全都连贯，配套材料齐全，连续使用 12 年以上，使用范围遍及全国，学习人数最多。且通过使用这套教材在专业教学能力、理论修养以及教学研究诸方面培训了几十万教师，并推动了全国的外语教改。1999 - 2001 年西南师大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在教育部基教司安排下，对全国省市区使用这套教材的首届高中毕业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其结果证实了这套教材在提高学习成绩、推进教学改革诸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效果。所以这部教材的实践价值之高在我国实属空前。

2、编写中克服的困难

中小学学生发展未定，编写教材时得考虑他们多种发展的可能以及持续学习中的衔接和新旧知识融会诸多问题。所以与编写专业教材相比，困难更多。概括而言，得克服两方面的困难。

(1) 选用合适的教学途径

语言教学的 **approach** 一词虽含观点和途径两义，而在实施中一定的观点却可采用不同的途径，交际教学法衍生了诸多教学模式，即为一例。所以构建华式结构功能法的观点之后，仍可采用不同的教学途径。就道义编审自己的经历说，她可能倾向于体验性途径。因为她在北外学英语，在北外及其附校教英语，在英国了解功能法。但鉴于中国极少存在体验性学习的条件和长期使用语法翻译法及短期试用听说法的经验，她扼制了自己的学术倾向而采用五步教学模式，走认知性学习的道路，这对于一位学者来说不是小事。

(2) 处理编写活动中的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既多种多样，有些还极敏感。首先，我国编写英语教材得在教育、乃至政治经济大格局的调控下进行，加之是中英合编，英方也有发言权，所以主编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其创造性，不能直率地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办。由于我国所处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教材里一张插图的位置也可能招致批评。且在合编活动中，主编既要统一中方意见，又要使英方了

解中方意旨，从而自觉地尊重中方的主导作用；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其次，选材既要考虑中外价值观的差异而谋求不同文化的互补，又得从语言教学理论有关优选内容的学说中择善而从，从而满足我国学生学习英语的需要；如满足他们在不同条件下继续学习、自学、考试等等需求。再者，在编排方面，既要适应全体学生的学习过程而组建一条循序而进的道路，又必须尽可能地放松对学习过程的控制，给师生留下结合具体情况去发挥其学习优势的可能性。尤其是我国各科教材自上世纪“大跃进”之后已逐渐采用阶梯式的直线结构，而英语教材又必须采用圆周式的螺旋结构，这也是一大难题。还有，尽管英语的变体已达5-60种之多，我们英语教材的语言仍得保持以之为第一语言的英美英语的规范。加之中英合编教材编写之际教育部又曾一度准许地方编写多种教材。所以中英合编英语教材的编写环境相当复杂，加之时间紧迫，如果主编不善于组织动员相关力量，是极难克服众多困难的。此外，除了编出课本，还得组织配套教材、教具的编制，尤其是必须深入一线培训教师，搜集反馈并据以修订。这些工作既得长年累月地坚持，还得审时度理，善用智力。道义编审和她的团队为此而穿梭于全国各地，其功其劳都非一言可表。

3、成功编写的条件

任何一种成功或不成功的事情，都有相应的条件，即导致其结果的因素。中英合编英语教材参与者虽多，而其主轴、主力都是刘道义编审。她何以能取得成功？个人认为有三点可以为训。

(1) 改革开放的大好环境

这是成功的大前提。其作用主要体现于三点：第一，教育要“三个面向”的理论导向。第二，教育部下放专业活动的权力。第三，在“人心思治”之动力作用下形成的以张志公、唐铎为首并与业界广泛联系的编写团队，由道义编审带上了。

(2) 主编的人文素质

人文素质是按真善美行事的轨道，不只是具有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而是人文理想、人文信念、人文关怀等所构成的素质。说得简要一点，是坚持自己的做人准则，不因价值观的波动而改变自己人生追求的素质。我国古代推崇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情操含有人文素质。现代追求的“做大事，不做大官”，包含了人文素质。中华文化用以评价学人成就之标准“道德文章”的道德，也包含了人文素质。作为一部全国适用之英语教材的主编，如果不具备高格的人文素质，是难以做好这件大事的。

(3) 主编专业基础宽厚

专业基础包含英语语言文化水平、汉语语言文化水平、中小学教学经验以及语言教育教学的理论修养。优秀英语教材主编必须兼具而不能或缺。比如，缺乏中小学英语教学实践的高级专家能为就业培训编出合用教材，却很难为中小学编出合用的教材。至于使用地道的英语及其蕴含的文化，对于以英语为外语的教材编者，更是一大问题。流行的补救办法是找外教校改，但他们不懂汉语文化，很难把握编者用意。在这点上道义编审获得了邓炎昌教授的全力帮助；由于英语、汉语都是邓教授的第一语言，因而他在保证教材之“语言地道”的同时，还能保证编写意图的充分贯穿。除了邓教授之外，道义编审还很好地发挥了英方作者的作用。这样，作为主编的业务基础就分外宽厚了。

上述三点只是从编写角度谈教材，说明它来之有据，来之不易，来之有效。至于教材本身的研究，那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课题；我们可以从继往开来的角度，研究它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其中是否存在可以促进我国英语教育与时俱进的规律和积极经验。

我不守写序的常规对道义编审的一项重要学术成就——中英合编的英语教材发表意见，并非不知道这部教材的停用命运，也不是道义编审的成就仅止于此。读者从她的自选集的内

容和平素与她直接、间接的交往中，自能窥见她的多方面成就与贡献，以及可供学习的种种优秀品质。我只写中英合编英语教材的价值、编写困难和导致成功的因素，是想点出我国学者自己创造的经验，供有心人借鉴；也供师生在了解一部新的英语教材时参考。历史不会重演，而历史经验却可长期有用。作为我国英语教学大发展时期之重要推动力量和教学情况间接记录的中英合编初、高中英语教材，其历史经验的价值不会与时俱逝。所以我相信读者、出版社、编者以至道义编审本人，都会认可我这样写序的真心实意。

谨序。

张正东
于西南大学外语学院
2006年3月

情系基础英语教育

——我与中国英语教育

当我收到入选《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系列丛书的通知时，我感到意外的高兴。出文集原本是我计划要做的事，但我未曾奢望过我的文集能与高等教育界英语大师们的并列。我自认是搞“小儿科”的，即中小学英语，当然应把我的领域限在“基础教育”的范围之中。

我与基础英语教育的缘分很深，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我虽不是出生于革命家庭，但确确实实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按照我的经历，可分五个阶段，我在这五个时期的亲身经历恰似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中小学英（外）语教育那艰难、曲折又光辉的历程。

一、学贵有师，扎实基础（1950—1960）

我于1938年生于南京，父亲是个商人，受过私塾教育，思想守旧，由于膝下缺子，他给我起了个男性的名字，而且把我打扮成小男孩的模样，还寄予了“厚望”。在他的影响下，我小学时练习过颜真卿体书法，读过线装本的经典小说《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画过古装人物图像等。我最早接触英语是1950年。我的老师是解放前一家报社的记者，英文水平较高，我那时丝毫不觉得英文难学。到了初二，我的第二位英语老师的语音语调纯正，音质优美，使我初次领略到英语的魅力。那时用的课本是林汉达的《初中标准英语读本》等。现在回想起来方知，那时，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中学的英语师资水平还是不错的，可惜后来“英转俄、俄转英”，弄得英语、俄语师资水平全都下降了。

建国初期的英语教材沿用了旧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尚未编外语教材。1951年教育部颁布的《初中英语课程标准草案》规定的目标是：“1、养成阅读和练习英语的兴趣，打下继续进修的基础。2、能认识一千至一千五百个一般的常用字。3、能练习运用常用的典型短语约二百句。4、能阅读生字不超过十分之一二的浅近英语。5、能作清晰熟练的书写。”这个目标很简单，对能力的要求很低，主要重视的是词汇和句

型量。我们这些学生并没感到有多大压力，只要临考前背记单词准能得高分。现在看来，当时的社会不大重视外语，又没有名目繁多的考试，虽然有课程标准，但并未严格要求贯彻。实际上，我们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当我于1953年上高中以后，第二年教育部就发出了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初中不设外国语科的通知，理由是为了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使学生能更好地学好本国语文及其他学科。初中停设外国语科直到1959年3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在加强高中外国语科教学的同时，仅在大、中城市有条件的初中开设外国语科。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亲密，俄语倍受重视。1953年我上了南京一中高中以后，中断了英语学习，改学俄语。所幸教师很好，是留在中国的“白俄”，他用的是前苏联原版教科书，上课用不了汉语，仅用俄语教授。到了考试时，他就叫我这个俄语课代表帮他在黑板上抄汉译俄的题目。还有一位中国教师教得也很好。我们的俄语语音和语法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据说，一中毕业的学生有的上了大学后可以免学俄语。可惜我上了大学丢下了俄语，又成了英语的“白丁”，得从ABC学起。

高中三年正值全国上下“向苏联学习”、“向科学进军”的火热的时期。身上穿着苏联花布做的衣裳，手中握着苏联的小说——《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心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高中生的形象。青年团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长江抗洪、中山陵露营、元旦聚会、畅谈理想……。《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下定决心要当一名语文教师，梦想着上北师大中文系。没想到临近高三毕业，我同其他十几位学生被学校推荐报考国家机要院校——全部是国家重点院校。这本是件十分荣耀的事，我却感到有几分遗憾，因为这里面没有师范院校，又无语文专业。唯一提供文科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于是我就选择了北外，上了英语系，学习“帝国主义语言”——英语，准备上外交战线工作。未曾想到四年后我被留校，在英语系任教，圆了我的教书梦。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从大学踏入中小学课堂，而后从事中小学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至今。

1956年夏，我与南京一中的同学集体乘火车北上。我们每人背着行李，在济南车站转车。等车期间，我们打开铺盖就地而卧。虽然很累，但心里美滋滋的，一想起即将抵达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就兴奋不已。到

了北京站我们就分别被北大、清华、北航、北外等各大院校的校车接到了自己的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即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仅有一座简朴的三层办公楼和一座三层教室楼，及几座师生宿舍楼，外加个大操场。其东面是新建的北京俄语学院（即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显得阔绰气派多了。然而，在这简朴的校园里却集中了全国外语界的精英，如许国璋、王佐良、周钰良、大卫·柯鲁克等。我有幸受教于陈琳、杨树勋、邓炎昌、熊德轸等教授，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大学一年级陈琳老师的语音教学。

北外素以培养翻译人才、重视外语口语教学著称，我记得当时英语专业主要是英国语言文学，设有精读、泛读、语法、口语等课。大学一二年级用的课本是陈琳、杨树勋、王光宗编写的。语音、语法基本功的要求很严，语音课整整花了八个星期。我们每个学生上课必须带小镜子，看着黑板上老师画的音素发音图，听老师讲该音素的发音部位，自己对着镜子找到正确的发音部位练习。单音训练伴随着音标拼读操练，我们称之为“口腔体操”。我们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操不同的方言，各自受方言影响，英语发音多有谬误，如北京人/v/与/w/不分，东北人/s/与/ʃ/不分。像我这个生长在长江边上的分不清/l/与/n/、/n/与/ŋ/，陈琳老师让我说“老刘快拿牛奶来”这句话，这一下彻底暴露了我的南京腔，除了“拿(na)”该带鼻音发成了“la”，其余六个字都带鼻音。我感到问题严重，需下狠劲儿练习普通话。我不怕同学们善意的取笑，反倒常常当众读报或念课文，欢迎他们纠正我的发音。我对一些词的发音没有把握就查字典。久而久之，我不仅掌握了英语 l、n 和 in、ing 的发音，还相应地纠正了我的汉语发音。直到今天，我们老同学聚会时回忆起当年北外老师的严格要求，心中仍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在大一和大二学的是基础英语，的确为我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大学三年级以上应以英国文学为主。但是，1957年以后，不断开展政治运动，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能保证，文学路子遭到批判。我们的老师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利用英语周报等材料自编了大量教材，在火热的政治活动和劳动的间隙给我们上课。英籍专家柯鲁克经常发表讲话，他强调英语是一种技能，要真正掌握英语需大量的实践，正像一个人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练习，而不是靠学习规则就能成的。于是，教口语的邓炎昌等老师就结合实际编口语会话材料。有趣的

是，高深的文学作品读得不多，但是我们接触了不少政治和劳动生产方面的词汇，如：sovereignty（主权）、hegemony（霸权）、blast（爆炸）、furnace（高炉）、lathe（车床）、commune（公社）、combine（联合收割机）等。

回忆大学的这段学习经历，我感到幸运的是遇到了好老师，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遗憾的是学得太少，词汇量小，难以自由表达。

二、教学实践，不断实验（1960—1977）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原计划派往苏联留学的300名学生由俄语系（此时北京俄语学院已与北外合并，俄语学院并为北外的一个系）转到英语系学习。为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英语系抽调了15位学生任教，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提前一年结束了学业。我虽然为能实现自己当教师的夙愿高兴，但毕竟少学了一年，自感“先天不足”，在教学中缺乏充分的信心。所幸英语系倡导“老带新”，每一位新教师由两位老教师指导。我的指导老师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张道真和周献桃老师。在老教师的帮助下，我不仅努力站稳讲台，而且还学习和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视听法和听说法，通过句型训练加大实践量，提高学生口、笔头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1961年夏，我被调往北外附校任教。离开学术条件优越的高校我心中不免有些惆怅，但是对于组织的调动我是绝对服从的。

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成立于1959年，隶属外交部领导。该校的成立直接得到中央领导的关怀。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外语要从小学起好”的指示，以陈毅为领导的外交部提出办外国语一条龙学校，并提供资金，由北外调拨人员，先设高中部，后设初中部和小学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继北外附校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创办了十多所外国语学校。时至今日，这些学校都已成了全国数百所外语学校中的“龙头学校”，办得十分红火。

从1961年至1977年，我在附校的高中、初中和小学都教过，而且担任过班主任和英语教研组长。这期间除有一年我回英语系进修和教课外，在附校共15年，经历了附校的鼎盛时期，也度过了其最艰难的时期。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我以后的发展做了铺垫。

北外附校英语教研组的教师几乎每一位的语言基本功都很过硬，

尤其是语音和口语水平都较高，其中大部分都是北外英语系的骨干教师。我们年纪轻，志气高，为了培养出高水平的外语人才不遗余力，想方设法探索多快好省的教学路子。从大学来到中学最明显的感觉是，学生年龄小、模仿力强，所以语音教学远不如教大学生困难。尽管在高中使用人教社十年制课本时通过精读课狠抓语音、书法和语法，但发现语言的输入量不够，学生的潜力难以发挥，于是提出了精泛结合的教学。北外派了语言流利、教学技能娴熟的范瑛老师来附校教泛读课，用简易读物 *Little Tom* 等做教材，效果很显著。不久，精读课的教材也由我们自编，要求高于普通中学。为了摸索出适合中小学生认知特点的教学路子，我们打破了文学路子，采用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句型教学模式。在小学阶段，我们曾试图用故事法教英语，把小人书译成英语直接用于课堂教学，中外教师组成组一起搭挡教学（team teaching）。附校曾派小学生赴美学习，曾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章启月（现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就是这批小留学生中的一个。那时小学还用英语开设地理课，并计划培养师资以使用英语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课，后因“文化大革命”，双语教学计划未得以实现。中美建交后，我们得到进口教材《英语 900 句》，就结合实际编写了类似的教材进行试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口语水平。

在上世纪 70 年代，学生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教学极度困难，同样的班里出现了两极分化，我与同年级的教师决定进行分层教学。我把那些学习“无望”的学生集中起来，用快速补课的办法，使他们感到英语学习有望，逐渐树立起信心来，以致后来他们绝大多数都成了外语界的有用之才。即使在带领学生下乡劳动时，我们也在田间地头教有关农村生产的英语会话；在强调教学与实践结合时，我们领着学生去动物园、颐和园练习用英语描述所见所闻。

附校不仅重视课堂教学，也很重视开展课外活动，每周都安排有一节课外活动，唱英语歌、搞书法竞赛、游戏、朗诵、演话剧等。全校组织过数次英语晚会，其中最为成功的是《长征组歌》英语演唱会。学生兴趣极浓，课间围着“钟声”牌录音机听、练习诗歌朗诵和歌唱，这使他们的英语语音语调有了很大的改进。每次的演出都会给师生留下难忘的记忆，演出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和人文素养都起着促进的作用。

北外附校对教师一向要求很严格，备课必须写教案。我记得有一次许国璋教授还抽查过我们的教案，对写得不好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

研活动订有计划，校内外听课交流活动频繁。而且，每周星期四下午为教师进修时间，由外教给我们上听说课。每个月有一位教师用英语发表主题演讲，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常回英语系听英语讲座，有一度还请了王佐良、丁往道等教授专门为我们附校教师上文学课。北外对附校外语教师的成长很关心，也采取了以上相应的措施，但我仍然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大学时期涉学不深，附校工作繁忙进修时间不够，教学范围窄，难以提高。我把这些进修措施看作“先天不足后天补缺”，思想上重视，克服困难坚持不懈。不过，使我受益最大的还是在文革后期，我发奋读书，从简易的原著《西行漫记》到经典名著《简·爱》、《巴黎圣母院》，一气读了几十本。同时，我收集了许多名人演讲和名著的录音反复听，而且还收听中外英语广播节目。读书读到高潮处常使人废寝忘食，甚至如痴如醉。精彩的演讲和配音朗诵的录音也常使人心动。通过这种自主的听读，吸收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英语，不知不觉感到“耳聪目明”，用英语思维多了，口语表达也顺畅多了。

在附校教书期间我们还编过初中和小学教科书。自编自辑，印刷厂排字印刷好，我们上印厂装订成册，然后蹬三轮板车把课本取回学校。1970年，北京市教育局从首都师范学院和北外附校等单位借调人员编写教材。我被调去脱产编北京市英语课本，约两年光景。我们当时受工人宣传队的领导，首先下乡下矿向工人、贫下中农学习，接受“再教育”，然后着手调查，制订编写计划，拟框架，选材、编课文、讨论修改、定稿后编练习和词表，最后发排。定稿后的教材需经工宣队审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连教 I have a book. You have a pen. 等句型也被批评成“宣传私有观念”。可以想象，在那种情况下要遵循语言规律来编写教材有多难。不过，从此，我对编教科书的程序有了初步的了解。

三、编写教材，面向全国（1977—1985）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事业如禾苗久旱逢甘雨，恢复了生机。1977年秋，教育部从全国各地调集人才编写各科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前向全国供应新编中小学各科教材，以取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编制的质量低下的教材。

1977年夏，北外附校的领导通知我，说我已被教育部借调参加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我随即到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报到。打那以后，我就步入了中小学英语课程教材研制和改革的新天地，由一